

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羨季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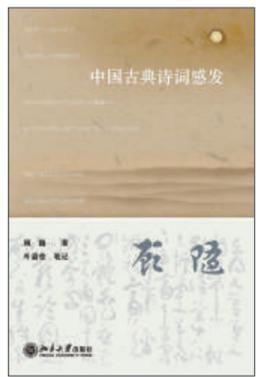
书与人

□ 叶嘉莹

顾师羨季先生本名顾宝随,河北省清河县人,生于1897年2月13日(农历丁酉年正月十二)。父金墀公为前清秀才,课子甚严。先生幼承庭训,自童年即诵习唐人绝句以代儿歌,5岁入家塾,金墀公自为塾师,每日为先生及塾中诸儿讲授《四书》《五经》、唐宋八家文、唐宋诗及先秦诸子中之寓言故事。1907年先生11岁始入清河县城之高等小学堂,三年后考入广平府(永年县)之中学堂,1915年先生18岁时至天津求学,考入北洋大学,两年后赴北京转入北京大学之英文系,改用顾随为名,取字羨季,盖用《论语·微子》篇“周有八士”中“季随”之义;又自号为苦水,则取其发音与英文拼音中“顾随”二字声音之相近也。1920年先生自北大之英文系毕业后,即投身于教育工作。其初在河北及山东各地之中学担任英语及国文等课,未几应聘赴天津,在河北女师范学院任教。其后又转赴北京,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任教,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及中国大学等校兼课。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担任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1953年转赴天津,在河北大学前身之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于1960年9月6日在天津病逝,享年仅64岁而已。先生终生尽瘁于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在各校所曾开设之课程,计有《诗经》《楚辞》《文选》、唐宋诗、词选、曲选、《文赋》《论语》《中庸》及中国文学批评等多种科目。在天津任教时又曾开有毛主席诗词、中国古典戏曲、中国小说史及佛典翻译文学等课。先生所遗留之著作,就嘉莹今日所收集保存者言之,计共有词集8种(共收词500余首),剧集2种(共收杂剧5本),诗集1种(共收古、近体诗84首),词说3种(《东坡词说》《稼轩词说》以及《毛主席诗词笺释》),佛典翻译文学讲义1册,讲演

稿2篇,看书札记2篇,未收入剧集之杂剧1种,及其他零散之杂文、讲义、讲稿等多篇,此外尚有短篇小说多篇曾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浅草》及《沉钟》等刊物上,又有《拙翁录》一种曾连载于《世闻解》杂志中,及未经发表刊印之手稿多篇,分别保存于先生之友人及学生手中。我之从先生受业,盖开始于1942年之秋季,当时甫升入辅大中文系二年级,先生来担任唐宋诗一课之教学。先生对于诗词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所以自此以后,先生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情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词,然而却从未曾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朗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于是自此以后,凡先生所开设之课程,我都无一不选修,甚至在毕业以后,我已经在中学任教之时,仍经常赶往辅大及中国大学旁听先生之课程。如此直至1948年春我离平南下结婚时为止,在此一时间内,我从先生所获得的启发、勉励和教导是述说不尽的。

先生的才学和兴趣,方面甚广,无论是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选、《文赋》《论语》《中庸》及中国文学批评等多种科目。在天津任教时又曾开有毛主席诗词、中国古典戏曲、中国小说史及佛典翻译文学等课。先生所遗留之著作,就嘉莹今日所收集保存者言之,计共有词集8种(共收词500余首),剧集2种(共收杂剧5本),诗集1种(共收古、近体诗84首),词说3种(《东坡词说》《稼轩词说》以及《毛主席诗词笺释》),佛典翻译文学讲义1册,讲演



《中国古典诗词感发》
顾随 著 叶嘉莹 笔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授诗词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位非常难得的好教师。先生之讲课既是重在感发而不重在拘执死板的解释说明,所以有时在一小时的教学中,往往竟然连一句诗也不讲,自表面看来也许有人会以为先生所讲者都是闲话,然而事实上先生所讲者却原来正是最具启发性之诗词中之精论妙义。昔禅宗说法有所谓“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言,诗人论诗亦有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语。先生之说诗,其风格亦颇有类乎是。所以凡是在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所谓记问之学的知识,先生一向都极少讲到,先生所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其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词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并且更能将之用多种之譬解,做最为细致和最为深入的传达。除此以外,先生讲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常把学文与学道以及作诗与做人相并立论。先生一向都主张修辞当

“以立诚为本”,以为“不诚则无物”。所以凡是从先生受业的学生往往不仅在学文作诗方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而且在立身为人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

凡是上过先生课的同学一定会记得,每次先生步上讲台,常是先拈笔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词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需要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需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于是先生遂又举引出杜甫《登楼》一诗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为前者之代表,陶渊明《饮酒》诗中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后者之代表;而先生由此遂又推论及杜甫与陆游及辛弃疾之比较,以及陶渊明与谢灵运及王维之比较;而由于论及诸诗人之风格意境的差别,遂又论及诗词中之用字遣词,和造句与传达之效果的种种关系,甚且将中国文字之特色与西洋文字之特色做相互之比较,更由此而论及于诗词中之所谓“锤炼”和“酝酿”的种种功夫,如此可以层层深入地带领同学们对于诗词中更细微的差别做最深入的探讨,而且绝不凭借或袭取任何人云亦云之既有成说,先生总是以他自己多年

来亲自研读和创作之心得与体验,为同学们委婉深曲地做多方之譬说。昔元遗山论诗绝句曾有句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先生在讲课时,其联想及引喻之丰富生动,也就正有类乎是。所以先生之讲课,真可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

先生曾经把自己之讲诗比做谈禅,还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这种讲诗方法,如果就一般浅识者而言,也许会以为没有世俗常法可以依循,未免难于把握,然而却正是这种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之富于启发性的讲诗的方法,才使得跟随先生学诗的人学到了最可珍贵的评赏诗词的妙理。而且当学生们学而有得以后,再一回顾先生所讲的话,便会发现先生对于诗词之评析实在是根源深厚、脉络分明。就仍以前面所举过的三句话头而言,先生从此而发挥引申出来的内容,实在相当广泛,其中既有涉及诗词本质的本体论,也有涉及诗词创作之方法论,更有涉及诗词之品评的鉴赏论。因此谈到先生之教学,如果只如浅见者之以为其无途径可以依循,固然是一种错误,而如果只欣赏其当时讲课之生动活泼之情趣,或者也还不免有买椟还珠之感。先生所讲的有关诗词之精微妙理是要既有能“入”的深体会,又有能“出”的通观妙解,才能真有所证悟的。我自己既自断愚拙,又加以本文体例及字数之限制,因此现在所写下来的实在仅是极粗浅、极粗略的一点介绍而已。

如我在前文所言,我聆听羨季先生讲授古典诗词,前后曾有将近六年之久,我所得之于先生的教导、启发和勉励,都是述说不尽的。关于先生讲课之详细内容,我多年来保存有笔记多册,现已请先生之幼女顾之京君代为誊录整理,编入先生之遗集,可供读者研读参考之用。

特别推荐



《城里的月亮》
俞胜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错位的阵痛与融合

读俞胜《城里的月亮》

□ 钟红英

读俞胜的文章也就在近一两年的时间,那时大约被他“把小说写得好看,把书评写成散文”的话所吸引,想究竟他的小说“好看”在了哪里,而书评又是如何与散文挂上钩的?以后就陆续在他的“指引”下看了一些文章,知道了他竟是个小说、散文、评论和报告文学的多面手。俞胜的散文文字优美,字里行间常常氤氲着一股山林雨雾般的气息,清新、俊逸却不脱智性的锋芒;而书评却并非真如我们印象中的“散文”,而是他向着“散文”的好读看齐,力避文字的干涩枯燥之意。小说却是好看的,印象最深的是何以他有这么御骨的“肌肤”之痛,让他处处把下层社会低微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困苦展现出来,表达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向乡间隐退”的过程中,城市正与乡村社会一起错位,人们在迷茫、困顿、浮躁与焦灼中,阵痛并融合着。俞胜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城里的月亮》多数篇什突出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拆迁问题是城市叙事中常见的题材,《水乳交融》讲述了这么一个拆迁故事:小市民樊慧娜与丈夫甘四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房屋出租款成为一家的经济支柱。但偏偏遭遇城市规划必须拆迁,在拆与不拆的对峙与焦灼中,作为“小我”的樊慧娜在稍作挣扎后很快便与“大我”的权力机构妥协;不过,另一种精神层面的抗衡却远没拆迁问题解决得快,那就是深深扎根在樊慧娜心中的城市人身份地位的优越感和生来自由的高高在上的精神洁癖。当发现租住在自己房屋的“外来农民工”李胖子在财富(钱比自己宽裕)、地位(丈夫成为他的打工仔)上胜过自己,甚至也和自己一样拥有房产人住高档小区之时,那一切看似固若金汤的优越感便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肉体的无所适从与精神的无所归依在《水乳交融》中表现得十分到位。

与一般拆迁题材不同,俞胜没有把重点放在“拆迁”题材通常表现官与民的对抗与妥协上,而是借助这个“象”的触角伸向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体系在城市化过程中文化的冲突与文化的和谐之上,表达一代人两个群体之间微妙的心理纠葛与心灵感通,这是一种时代的症候,也是当前乡村题材小说城市意象书写的又一重要表现手法。可贵的是,俞胜对现实存在问题的揭示和追问,对卑微生命的描摹与刻画,从来都不是带着仇恨或鄙视的心态去控诉或诅咒,而是带着深沉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去表现这些生命并呈现这个时代,让我们在温暖的触痛中去看透生命的形态与时代的病象。事实上,俞胜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是生活于底层的小人物,无论《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的研究生“我”,还是《城里的月亮》的男主人公小帅,抑或是《老乡》中的副处级干部姚小帅,他们本质上无一不以“外乡人”的身份生活于这个“城市”之中。但就是他们这样的小人物,有责任感、同情心,讲究亲情友谊,与通常的城市钢筋水泥的冷漠与疏离构成了强大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我们赋予乡村宁静、质朴、敦厚的精神想象,是一种神性的“世外桃源”。只不过,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物”日益占据中心,而“人”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载体不断边缘化的当下,这种“世外桃源”究竟残存几呢?

此外,俞胜《城里的月亮》还收录有一些寓言体小说《人、狗、狼》《失落在街头的小鱼》《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蚂蚁》等,颇有特色。与前述关注社会现实当下的小说相比,这些寓言体小说借助动物界的“它”眼光、“它”语气,表达对幸福的真谛、个性自由、人尽其才等等社会哲理问题的反诘和思考。有意思的是,俞胜这组文章的主人公也是“它”界的弱者卑微形象,但它们却不屈从命运,于是狗仗人势也敢对狼怒吠,小蚂蚁借人势也敢在蚊王面前耀武扬威,但无一例外,它们在“人”面前又不得不奴颜婢膝处处小心地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一个身体两副面孔在它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下社会的极度畸形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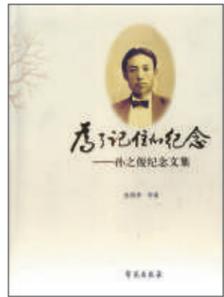
俞胜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是有极清醒的认识的,他说他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以写实的笔法直书社会,二是要以寓言的手法反映现实。应该说,这“两条腿”如今都已迈出了十分坚实的步伐,也愿他在今后的小说道路上,越走越远,期待着更多的好作品面世。

新书快递



《莫言: 诺奖的荣誉》
朱向前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朱向前有莫言的同学、最早的鼓吹者和诺奖预言者的三重身份,书中收入他近30年跟踪研究莫言的文章约20万字。其中既有最初的发现和最大胆的预言;也有最热烈的赞扬和最激烈的批评。莫言的序言,道出了他们的同窗同道之道;朱评莫言,见证了莫言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神奇过程……这是目前国内唯一零距离、长时段解读莫言的权威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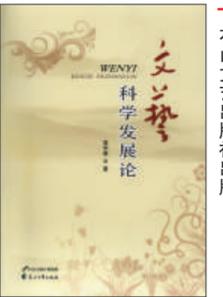
《为了记住的纪念》
孙燕华 等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

书中86位作者以学术评论、纪实散文和现代诗歌等不同文体纪念中国早期漫画家、现代连环画的开拓者之一孙之俊先生诞辰105周年。书中收录了孙之俊先生的水彩、写生、漫画和连环画作品及珍贵的资料照片。作者大多是孙先生的老学生,他们以亲身经历和感受,朴实生动、真诚感人地追思自己的老师,让这本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易经画传》
李燕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李燕在多年研究《易经》的基础上,故经今译,并配以图画的形式解释译文,加强读者对译文的印象,激发读者研究《易经》的兴趣。《易经画传》于1993年首版面世之后,先后在大陆与台湾一版再版,并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语版本。近日,作者李燕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释文和新解内容重新增订的《易经画传》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再版发行。



《文艺科学发展论》
袁学骏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对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一次回眸与省察,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的规律和道路。本书的关键词是:重温、总结、科学、创新、发展。作者力图吸收各家观点,从而把古今中外各种文艺理论打通,找到其中并行不悖的元素,对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文艺生态平衡和文化产业等问题尽量充分阐述。

性灵真处见心肝

——评《文家驹诗文集》

□ 余三定

品读斋

收到已故诗词名家文家驹的《文家驹诗文集》,自然十分欣喜,当即细细品读,可谓享受精神的盛宴、审美的快乐。读后要说得话很多,在这里只选取其“诗词”部分简略地谈谈我的读后感。文家驹《南湖春兴八首》(1981年)之七中写道:“学闲深时精格律,性灵真处见心肝。”我以为,“性灵真处见心肝”既是文家驹作为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诗词创作所追求、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文家驹作为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世情怀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成为他的自觉追求和内在的心灵气质,所以,任何时候他总是与时代的脉搏一同跳动,时代精神、人情怀是他诗词创作的永恒题材和主题。他写于1936年的《卢沟桥事变》中写道:“十年战伐伤元气,万里河山让异邦。枪口奈何

偏对内?平倭不许上战场!”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行为给予了尖锐的抨击。写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写道:“卢沟炮响五洲惊,誓与倭奴决死生。四万万人齐怒吼,排山倒海撼东京。”表现了誓死抗日的决心、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写于1945年的《喜闻日寇投降》中写道:“倭奴献表已投降,四亿炎黄喜若狂。鼓角联营歌破虏,流亡相计整归装。”可谓写尽抗日战争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无比喜悦和兴奋。写于1949年的《花品十首·桃李》中写道:“人爱李花白,我爱桃花红。白色成恐怖,红旗唱大风。”诗中将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鞭笞、对共产党胜利的由衷歌赞放在一起写,形成鲜明的对照。写于1980年的《洞庭诗社成立口占二绝为贺·二》中写道:“十年浩劫乾坤暗,浊浪排空”

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由衷歌赞和喜悦。读文家驹的诗词,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诗人所处时代的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前进、民族的发展,更可以感受到诗人和时代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宽广胸襟和高尚情怀。家国情怀、民族爱、自觉的担当精神,这就是文家驹真“性灵”的最重要的内涵。

文家驹是有自觉担当精神的诗人,同时是特别热爱生活、特别富有生活情趣的诗人,所以他的真“性灵”同时表现在他写日常生活和人之常情的诗词中。文家驹与朱蕴聪女士于1936年结婚,这一年文家驹写了两首爱情诗,一首是《无题》,诗中写道:“不尽相思不尽愁,但凭文字写温柔。何时得遂平生愿,夜月西湖共泛舟。”另一首是《题结婚照片集》,诗中写道:“三生花草梦苏州,红是相思绿是愁。今日不抛闲泪涕,此身孤注掷温柔。”两首情感

真挚而浓烈,想象丰富而浪漫,两首都出现“温柔”一词,可以见出文家驹的性情和诗词又都具有“婉约”的一面。写于1935年的《矛盾》极富人生哲理,其最后一节写道:“今日之矛,攻昨日之盾。一会儿消沉,一会儿兴奋。”可谓写尽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和心态,至今读来仍能引起我们的深深反思和长久回味。写于1964年的《校庆同学诗偶成·二》写道:“白发虽增暮气减,豪情应有芷兰知。”这是真正热爱生活和人生的人才可能具有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是大诗人的境界和胸襟。写于1987年的《题年历短句三首·三》写道:“兔年弹指又龙年,一隐一现龙尊全。宠辱皆忘参正觉,巋湖风月入吟笺。”表现出诗人被大自然的“风月”所陶醉,因而忘记了人世的“宠辱”。写于1992年的《儿童节戏成两绝句·二》写道:“八十年来真是梦,梦回仍是老顽童。”显示

出诗人真正做到了永葆童心。读文家驹的这部分诗词,我们会觉得,文家驹不仅是严谨的、有正义感的、有担当精神的诗人,而且是热爱生活、善于享受生活的可爱的诗人。

文家驹精研中国古代诗词,学问渊博,造诣深厚,同时精心创作,一丝不苟,所以他的诗词能很好地做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写于1981年的《纪念鲁迅先生一百周年》第一节写道:“好句唐人多说尽,后人何处觅新诗。唯公跳出如来掌,秋霜春温笔一枝。”文家驹对鲁迅诗词不落窠臼、独标一格非常赞赏,其实也表达了他自己的创作追求。写于1982年的《绝句三首·夜吟》写道:“苦吟寒夜不知眠,儿女讥余学唱禅。禅味不如诗味好,新成绝句似樊川。”说明文家驹的诗词创作既是凭他的才气、灵感,同时也得力于他的用功和勤奋。后一方面正是他“学闲深时精格律”一句的有力印证。